

一切人员严加保护学校及全体学生，维持学校秩序，从此，清华投入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从清华解放到北平解放的一个多月中，大家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一方面各系级组织制作宣传标语，准备北平解放后进城宣传，一方面传看介绍解放区的书籍如《冀东行》等。不久部队文工团表演《白毛女》《赤叶河》等解放区的话剧、歌剧。地下党组织也进行调整，一是改变过去单线联系的做法，可以相互打通关系；二是南北系合并组织支部，我们和北系的党员温益友、葛琴林等一起成立土木系支委会。为了迎接北平解放，成立了清华大学迎接解

放服务队，共有 2000 多名学生和 200 多名教师在北平城区参加为期两周的宣传工作。

从 1946 年 10 月进入清华大学，到 1949 年 2 月我进城宣传，历时不到三年，可是，对我来说，终生难忘。2 月，参加在北大四院召开的党员大会后，王汉斌同志通知我，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不要回学校了，留下来参加革命工作，即被分配到市委学委大学部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我在清华园的生活。

（本文节选自储传亨学长的自传，由储学长夫人陈瑞美 2017 年 1 月提供，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的黄鹤楼传奇

○向欣然（1963 建筑）

设计黄鹤楼之前，我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后来被吸纳到重建黄鹤楼的设计队伍中来，也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客串”而已。但是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我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了“反客为主”的华丽转身，历时 8 年，主持完成了黄鹤楼重建工程的总体规划和全套建筑设计，并配合施工直到黄鹤楼重建落成，被称为“黄鹤楼的总设计师”。

黄鹤楼的设计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因素，富有传奇色彩，故值得记录在此供大家分享。

1978 年夏，“文革”的硝烟刚刚散去，武汉市就传来了好消息：毁于清朝末年（1884 年）的黄鹤楼又要启动重建了。

这已经是解放后第三次启动此项目工程：第一次是 1957 年，因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占据了黄鹤楼故址，武汉市政府遂提出重建名楼的设想，建筑方案拟恢复清末同治黄鹤楼式样，此举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同意和支持，后因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筹建工作被迫下马；第二次是 1975 年，据说是为了纪念“毛主席 1927 年登临黄鹤楼故址 50 周年和 1957 年指示重建黄鹤楼 20 周年”，准备在 1977 年重建落成黄鹤楼。不料在设计后期有人爆料称：清末同治黄鹤楼是为庆祝曾国荃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建，“政治上有问题”。于是筹建工作再次中断。



上世纪 90 年代初，向欣然学长夫妇在黄鹤楼前

这次再度启动重建，首要任务就是重新确定黄鹤楼的建筑样式。为此，湖北省委特作出指示，要求“创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点的黄鹤楼”。工作方法上，也一改过去只委托一家设计单位提供方案的做法，而是面向武汉市广大建筑设计人员征集方案。这对有心弘扬中华建筑文化的人来讲，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的中学阶段是在武昌度过的，对黄鹤楼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在武昌住校，周末回汉口的家，往返都要乘船过江，而轮渡码头就在黄鹤楼故址的山脚下。照说，我应该积极主动参加方案设计才是，但我采取的却是冷眼旁观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此时刚从学习班解脱出来，尚未分配工作，可以说是惊魂未定，万念俱灰，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老话说：祸兮福所倚，倒霉也有转运的时候。正因为我当时手头没有工作，也未报名参加重建黄鹤楼的设计，所以就有人找上门来了。我院有一位姓高的高级建筑师，热衷黄鹤楼设计，他做了一个方案

苦于无人帮他画透视图，在电脑制图尚未兴起时，画透视图就是建筑师的“看家本领”。我长于此道，于是帮他画了一张钢笔淡彩的全景式效果图。

1978 年 7 月，全部征集来的方案都在汉口集中展出，我院那位高工的方案颇为引人注目（大概那张大透视图也起了一定作用），特别受到主管此项工作的市领导的青睐，因此入围呼声很高，顺利通过了第一次评选。

高工的方案初选入围，大大鼓舞了我院的士气。为了扩大优势，院里决定专门成立一个黄鹤楼方案设计小组，集中兵力攻关。小组由 4 人组成，我也就成了 4 人之一。指定我的任务是：一、继续为高工画透视图；二、在高工原方案的基础上再做一个“补充方案”，以供比较备选。

我就是这样不由自主地来到重建黄鹤楼的设计中，而且以后再也没有离开。

应该说，我们当时都是按照省委的指示在做设计，怎样使新的黄鹤楼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特色”成为我们最大的难题。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黄鹤楼”应该与传统的古代黄鹤楼有所区别，除了建筑体量加高加大以外，在建筑形式上必须有所创新，常用的手法就是对古典的形式进行简化或者在传统中适当加入一些符号式的现代元素，这就是建筑界通常说的“社会主义新风格”。

高工的方案就是这样做的，我的“补充方案”也是这样做的。具体来说，“补充方案”除了对原方案的体量、比例作了一些调整以外，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楼身增添了雨篷式的“水平挑檐”，用来代替古建筑传统的“层层飞檐”。

经过武汉市第二次筛选，“补充方案”和其他方案一起被送往外地征询专家意见。结果，“补充方案”居然得到了包括杨廷宝先生在内的国内著名专家的好评，认为：“南方特点较浓，形式有所创新”。最后，经过设计院内部、武汉市和湖北省逐级评选，“补充方案”被选为“推荐方案”，准备向国家建委推荐上报。

就这样，我从“客串”开始，逐渐唱起了主角。不过得知方案中选的消息，我却是喜忧参半，因为我对自己的方案并没有信心。我清楚，这个方案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无法让人识别它是“黄鹤楼”；二是建筑语言“古今杂陈”，形式不统一，不伦不类。如果真要按这个方案实施，是要遭后人唾骂的。

不料时隔半个月，就在我内心纠结的时候，又传来省里的“新精神”：省长认为该方案的“民族风格不浓”，主张采用传统的“层层飞檐”。省里要求再做一个新方案以资比较，并要求新方案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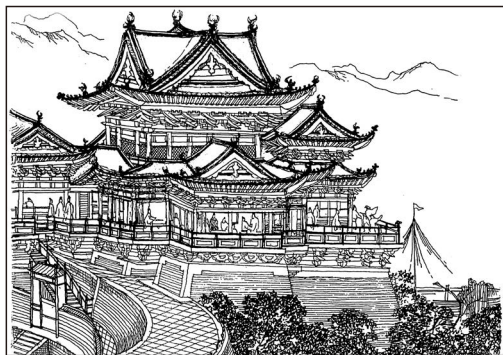
得知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过去我只是对别人的方案进行修改与加工，现在我可以重新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鹤楼了。

最令我高兴的是，终于弄明白省里要求的所谓“社会主义时代特点”，与建筑界说的“社会主义新风格”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不要求、甚至反感“建筑语言”的所谓“创新”，他们理想的“社会主义黄鹤楼”，仍然是一个采用传统古建形式的黄鹤楼，只是比古代黄鹤楼更高大、更雄伟而已。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仿古建筑”，只是仿古建筑的名称当时还没

有正式出现。

在建筑风格问题明确之后，建筑形象的认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让公众识别、认同新建的楼阁就是黄鹤楼，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选择老百姓熟悉的历史原型作为建筑创作的基础，由此创造出来的新形象，由于包含原型的基因和特质，老百姓是完全能够识别和接受的。

建筑界最熟悉的当然是宋代界画《黄鹤楼》图中的形象，但是武汉广大民众不熟悉；而且今天的新楼址已非画中“依山临江”的形势，完全不能实现画中楼阁的布局方式了。因此我们放弃了以宋楼为原



宋·界画《黄鹤楼》图（根据原画照片描绘）



清·同治黄鹤楼（1868—1884）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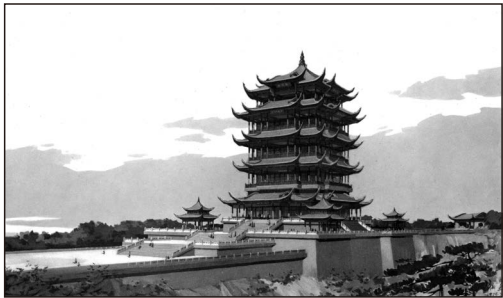
型的设想。

武汉民众最熟悉的是建于同治七年（1868年）、毁于光绪十年（1884年）的清末最后一座黄鹤楼。它的形象有历史老照片传世，并被广泛用作商品广告和商标，可以说妇孺皆知。特别需要指出，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自清代始300年来所建的黄鹤楼都采用了与同治楼一样的建筑形式（高三层，“直楼”式的塔式楼阁）。因此，以清代黄鹤楼作为设计原型是最合适的了。它的塔式体形也特别适合新的楼址较为狭窄的山地地形（见下图）。

有人担心同治楼的所谓“政治问题”；其实即使同治楼真有“政治问题”，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设计并不是以恢复同治楼为目的，我们设计的新楼形象会与同治楼有很大的区别，我继承的只是以同治楼为代表的清楼的普遍特征。

由于设计思想明确，所以新方案很快在一个月内完成了（1979年3月）。

新方案上报省里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向国家建委正式提出送审。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和地方的经济都很困难，省里把黄鹤楼工程上报给国家建委的目的，



以清代黄鹤楼为原型的新楼方案，湖北省政府1980年批准实施

除了想获得技术上的帮助，最主要的是想争取国家的财政拨款。

1979年12月初，我和黄鹤楼筹建办公室的负责人等，带着省委的上报文件和设计图（我的“补充方案”和新方案一并报上）来到国家建委。设计局为我们组织了三场座谈会，邀请了国内著名建筑师和其他专家（如张镈、戴念慈、王华彬、单士元等）给我们的方案提意见。意见主要集中在总图布置方面，而对两个方案如何选择，大家都讳莫如深，就是不表态。设计局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不想承担审查的责任，极力回避财政拨款的问题。最后会议没有结论，也没有批文，只给了一个会议纪要。

1980年2月26日，省里召开了最后一次方案审查会。省长主持会议，他在会上说：“黄鹤楼方案老是定不下来，只好我们来定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看这个方案（指‘新方案’）好，不要再讨论了。”会议最后，省长还不无担心地问了我一句：“将来房子盖起来，有没有你画的好看？”我赶紧回答说：“中国的古建筑有很多精彩的细部，我的透视图太小，画不出来。将来房子盖起来肯定比图上画的还要好看。”

至此，从1978年夏开始，到1980年2月为止，历时一年七个月的方案设计工作，终于画上了句号。

方案设计的完成仅仅是黄鹤楼重建的开始，施工图设计对我是更大的考验。黄鹤楼是千古名楼，又是国内第一次修建的大型仿古建筑，我所遭遇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老实讲，我自己清楚：我并非黄鹤楼设计的最佳人选。我年轻（按当时的标准，

40岁显得“太嫩”），名不见经传，缺少工程经验（“文革”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学习班”里度过的），没有高级职称，更未担任过技术领导；尤其是，我的专业背景为普通的建筑学本科，而非古代建筑研究，这些都是我的弱项。难怪在市里召开的第一次黄鹤楼工程协调会上，主管该项工程的副市长当众质疑我：“你能把黄鹤楼搞好吗？”我站起来大声回答：“搞不好黄鹤楼，我去跳长江！”一语既出，四座皆惊。这个场面后来被媒体广为报道，传为“佳话”。后来我与这位副市长在黄鹤楼工程建设上互相配合，成了十几年的好朋友。

当年，我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源于以下的优势：我毕业于六年制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所受的教育与训练，使我对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基本功抱有充分的信心。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培养出的学风，使我在继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问题上，有一种使命感。在近两年方案设计过程中，我学习并掌握了黄鹤楼的历史文化知识，积累了许多中国古代建筑实例资料，使我在设计创作中能很快进入角色。我相信，有了这些基础，只要自己努力学习是可以把黄鹤楼设计搞好的。

为了能胜任这项任务，我抓紧一切机会“恶补”古建筑知识，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母校建筑历史教研室编辑出版的六辑《建筑历史论文集》，成了我活学活用的教材。

我还遍访名师，请求他们指点。东南大学童寓老先生指导我：“重建黄鹤楼既然不是古建筑复原，就不必死扣传统做法，关键看大轮廓、大气势。我看你这个方案可以交差了，与清式黄鹤楼差不多，老百姓可以接受。”

姓可以接受。”

我还拜访了母校吴良镛先生，他的教诲中更多了一份对学生的关爱，希望弟子在工程中不要出差错。他说：“我同意以清楼为基础。清楼有个性、有特色的东西一定要保持，有些装饰和做法可以变通……仿古建筑中采用新材料一定要慎重、要稳妥，不能拿工程来做实验。”

华南理工大学龙庆忠教授是我国南方最著名的建筑史学家，他告诉我：“清代黄鹤楼的结构形式，直通向上，叫‘直楼’，是楼阁史上的孤例，有独特的价值。”他对我的设计思想表示支持。北京市园林局韩惠生高级工程师，是解放初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的老学长，对古建园林的修缮、施工有丰富的经验，他教我许多古建造知识，使我受益匪浅。

可以说，我的施工图设计过程，是一个边学习边设计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边设计边施工的过程。为了密切配合施工，有相当数量的施工图是我住在工地现场完成的。在紧张施工的那些日子里，我1.8米身高的汉子，体重直落到60公斤。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启动重建程序以来，省里有关文件和领导的指示，都没有提到黄鹤楼的功能——黄鹤楼盖好以后，里面干什么用。省政府对黄鹤楼工程计划任务书的批复中，也仅仅将黄鹤楼定义为“风景游览建筑”，并未列出具体使用要求。

直到主体结构施工到第二层，由于室内设计的需要，才将确定楼内功能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最初的功能设想是我提出来的，作为一名建筑师，实际上此时已经担负起项目策划的任务了。

从历史来看，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

(223年)的黄鹤楼,早期一直是作为军事用途的城楼。从唐代开始,新修的黄鹤楼才成为官商士绅、文人墨客“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游览胜地,从唐诗中的描绘可以看出,黄鹤楼不但供游人登临观景,也有类似酒楼的功能。明、清两代,楼内更多了一项内容,这就是“层层供奉吕仙(吕洞宾)像”,向游人宣扬神仙文化。

那么,我们今天是否要把黄鹤楼建成一座大酒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今天的餐饮业早就彻底物质化和商业化了,已经失去古人“酒中寻诗”的雅兴和文化意蕴。而“供奉神仙”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楼内空间的展陈功能,把黄鹤楼打造成展示自身历史文化的博物馆。

随即,我为各层大厅拟定了不同的文化展示主题。一楼:神仙文化;二楼:建筑文化;三楼、四楼:诗文化;五楼:回望历史。这些主题将分别通过壁画、雕刻、模型、图片、书法、楹联等展陈手段予以展出。

我的设想很快得到省市领导的赞同和批准。1983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新任武汉市



1985年6月10日,作者在黄鹤楼落成典礼上与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右)合影

委第一书记来黄鹤楼现场视察,由我汇报设计情况,我像一名“导游”一样,从楼外到楼内、从一楼到五楼,描绘着黄鹤楼建成后的美好景象。书记听得很入神,突然,他问我:“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平生最怕别人当众问我是什么家庭出身,最不怕别人问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当即回答说:“清华大学。”书记听了很高兴,说了一番鼓励的话。

经历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已经多年没有听到别人关心你的学历了。今天的际遇,使我感到温暖。后来知道,这段时间,中央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的切身感受是,那段时间里,我在设计中所提出的一些构想和意见,都非常受尊重。

经过5年紧张的工程设计与施工,一座新的黄鹤楼终于在1985年6月10日重建落成。在落成典礼上,电视台记者采访我,问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说了一些客套话,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想大哭一场,借以释放多年来积累的心理压力。

黄鹤楼作为武汉市的名片,武汉历史文化的象征,在历史老楼毁去100年以后,重新获得再生,无疑是武汉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也因此有了一点小名气。1987年,我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完全得益于此。

黄鹤楼的重建落成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拐点。我由此前“有的话别人能说,你不能说;别人说错了是认识问题,你说错了就是立场问题”的黑五类子女,摇身一变成了“国家主人”,令人唏嘘,令人感慨。我老婆说:正因为 you 那时刚从“学习班”出来,所以才碰上了黄鹤楼设计。你这是因祸得福。